

# 语言与社会互动：从语言相对论到批评话语分析

尤泽顺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350007)

摘要:从历史维度简要回顾了语言相对论、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语言研究角度对批评话语分析(CDA)的影响,指出 CDA 吸收了它们关于语言与社会互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形成新的语言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分析手段。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语言相对论,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6)05-0024-08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5.002

## 1. 引言

尽管受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广泛影响,批评话语分析(CDA)一直把自己视为一种“语言学研究范式”(Wodak & Meyer 2009: 4),其关注核心是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就此而言,它受到了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的影响(同上:1),并可一直追溯到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Stubbs 2002)。本文从历史维度简要回顾了上述语言研究对 CDA 的影响。

## 2.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在语言研究领域,一提到语言与社会现实或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由此,一些学者认为 CDA 的互构观取自于语言相对论(Stubbs 2002),从 CDA 对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论述来看,它们之间的确有相似之处。

语言相对论的主要思想最早见于萨丕尔(1929: 209)的论断“语言强有力地规范着我们的思维”和“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是由语言决定的”等。他认为,“社会现实”(“现实世界”)并不是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一个语言建构的世界;不同语言限制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使操不同语言的人看到不同的世界。语言的建构作用具体体现在哪里?它如何能够建构世界呢?萨丕尔在更早的时候曾做过一些解释(Sapir 1912)。他指出,语言作

为一种符号综合体,反映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两种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及其在语言中的反映可以发生在语言的词汇、语音系统和语法(包括构词法和句子组织规则)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这种相互影响和反映的关系在形成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会一直保持持续的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与环境变化的速度和频率出现不同,相互间的关系也表现得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到了难以察觉的地步。

可以看到:(1)萨丕尔认为语言的词汇、语音系统、语法反映了人们生活其中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不同群体由于其生活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习惯,反过来,不同语言习惯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不同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同语言习惯建构,其逻辑是“语言反映了世界,语言限制了人们的认识,世界由语言习惯建构”,语言与世界间存在一种辩证的互动;(2)萨丕尔强调了“兴趣”对于物理世界进入人类语言并得到反映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世界可以直接进入人类语言并得到反映两个方面,这隐含着一个重要事实,即“语言建构世界”实现的中介是人的认知;(3)萨丕尔说,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在语言中的反映可以发生在词汇、语音系统和语法等语言系统本身固有组成部分的任何一个部分,这表明,他所说的“语言习惯预设我们的理解方式”指的是“语言系统本身限制了人们的认识,建构了与该语言相一致的独特世界”。

对此,沃尔夫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就霍皮语和英语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特点进行比较,指出这些特征差异会造成霍皮语部族对目前西方世界运用西方语言归纳出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的认识偏差,甚至是认识混乱和误解。沃尔夫不仅赞同萨丕尔所强调的几个方面,且在语气上更加明确绝对,“语言本身其实就是观念的塑造者”,“世界

作者简介:尤泽顺,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评话语分析与权力政治、跨文化交际学。电子邮箱:youzsh@fjnu.edu.cn

\* 本文系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话语与社会互动的认知机制研究”(编号 JA1303)和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话语与福建区域形象的修辞构建”(编号 20140B070)的阶段性成果。

只有经过头脑中的语言(学)系统的组织才得以被感知”,“我们是沿着母语所设定的路线去切分自然的”,“如果不遵守约定认可的语言材料组织和分类法则,我们根本就不能开口说话”,“同一物理证据不可能使所有观察者都得到同一宇宙图像”,“各种概念系统(包括我们自个的)之间的相对性及它们对于语言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Whorf 1940)。

将 CDA 的相关理论阐述与萨丕尔-沃尔夫的观点进行对照后发现,两者表现出一些相似之处。首先是语言与社会的互构关系。CDA 研究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89; van Dijk 1993)……“话语由社会建构,受到社会的限制”,反过来,“话语建构了情景、知识对象、人与人之间及群体间的社会身份和关系”(Fairclough & Wodak 1997: 258),这与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反映社会现实、语言限制人的认识、世界由语言建构”的说法极其相似。其次是人的认知的中介作用。许多 CDA 研究者都强调了这一点(Wodak 2006b; Wodak & Meyer 2009; Hart 2005, 2011),范戴克(1993: 117)更是明确提出话语与社会是按照“话语-认知-社会”三角关系来互为建构,并集中从“语境和知识”等社会认知角度进行解释,奇尔顿(Chilton)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考察政治和国际关系框架内的话语(Wodak & Meyer 2009)如何借助于人的认知方式(如隐喻)在人的头脑中建构出对某一事物的不同认识。相比之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认知的中介作用的探讨仅限于“必须是人类感兴趣的世界才能进入语言并在其中反映出来”及“世界只有经过人头脑中的语言系统的组织才能被感知”等描述,没有对这一作用的运作机理及其他细节进行较为细致的考察和研究。

基于此,斯塔伯斯(Stubbs 2002)认为,“CDA 是沃尔夫假说的‘孩子’(即沃尔夫假说的发展)”。可是,为何 CDA 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受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影响呢?我认为,原因应该至少有两个。首先,CDA 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都认为“语言限制了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是两者对“语言”的理解是不相同的,萨丕尔和沃尔夫所说的“语言”是指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在内的抽象语言系统(即索绪尔说的 *langue*),CDA 的“语言”主要指的是 *discourse*,即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use in speech and writing*,索绪尔说的 *parole*)以及与语言使用相关的非语言行为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因素。CDA 一再声称他们的研究不同于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注重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语言学理论,他们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具体的语言使用。从这个角度看,斯塔伯斯所说的“CDA 只不过是把沃尔夫‘语言间

的差异性是否会造成说话者习惯性思维的差异?这一问题变为‘同一语言不同使用模式是否会造成说话者习惯性思维的差异?而已’是有一定道理的,即 CDA 只是把萨丕尔和沃尔夫的研究重点从“不同语言系统差异与思维的关系”变为“语言内不同语言使用与思维的关系”。如果将近些年来学者们提出的“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表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更应该是一种有关‘语言行为’而不是‘语言能力’的假说”这一论点考虑在内,那 CDA 强调研究语言使用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事实似乎进一步证实了斯塔伯斯的观点。其次,CDA 一再强调自己是一种社会性的语言研究,与一切传统语言研究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其与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研究也不同。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89: 13)指出,传统的语言研究分为两大类:语言本体研究(普通语言学)及语言其他方面研究(应用语言学),语言本体研究被放在了语言研究的优先位置,其他方面研究则被视为其补充或辅助性研究。从批评性角度来看,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把本来相互间有联系的研究(如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切分开了,同时把语言的社会性因素放在次要地位。语言的批评性研究与传统做法不同,它把广义上的语言社会性研究放在语言研究的中心地位,尽管它也使用语言手段分析语言现象,但语言研究主要不是为了分析语言本体特征,而是为了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为此,CDA 不断重申它们受到社会批评理论的强烈影响,其互构观主要是在吸收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等为消除“结构决定论”而提出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Blommaert 2005)。相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从不被 CDA 提及,因为它讨论的恰恰是语言本体与世界的关系,是传统语言研究的一部分,其理论取向与 CDA 的研究视角有所不符。

### 3. 篇章与篇章结构

目前学界对于“篇章语言学”的界定没有较为一致的认识,本文主要讨论博格兰德(Robert de Beaugrande)和德莱斯勒(Wolfgang Dressler)的观点和范戴克的研究,因为前者的观点受到包括 CDA 在内的相对较多人的赞同,后者的研究与他本人在 CDA 的研究具有密切联系。

对于传统语言学主要集中在静态描述句子语法的做法,博格兰德和德莱斯勒提出了批评。首先,它仅仅对语言结构进行静态描述,没有考虑语言结构形成的动态过程;其次,在交际中,规律、策略、动机、倾向和错误有时比语法规则和定律来得重要;再次,在现实的分类中,全面优势有可能比严格意义上的范畴更管用;第四,对于具体篇章,可接受性和合乎

场合可能成为比语法正确和形式完整更重要的评判标准;第五,对于篇章的知识使用和表达,人的理性可能比纯粹的逻辑证据更有意义(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F2)。他们主张把语言研究视野从句子形式的静态描述拓展到篇章构成及使用的动态描述,以此对传统语言学研究做出补充(同上:F1)。据此,他们把篇章定义为“一种交际事件”(同上:2),表明它不是一种静态的语言形式,而是动态的交际活动,并强调任何非交际性的“篇章”本质上都不能算是篇章。篇章必须满足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目的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信息性(informativeness)、情景性(situational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七个要素。篇章语言学要超越传统语言学研究,把研究关注点放在: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和交际情景、交际实践中的实际语言使用,语言之外的社会、认知、文化语境因素,语言使用的过程性和动态性等。

这些概念和特征成了包括篇章语言学在内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论基础,也得到CDA的赞同。CDA和DA的共同点在于:

(1)感兴趣的是那些真实语言使用者“自然发生”的语言使用现象的属性,不研究抽象的语言系统和人造的语言实例;(2)关注那些比独立的词或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分析的基本单位是:语篇、会话、言语行为或交际事件;(3)把语言学从句子语法层面研究延伸到行为和互动活动研究;(4)把研究对象延伸到互动和交际活动中的非言语(符号、多模态、视觉)因素:手势、图像、影像、互联网和多媒体等;(5)关注动态的(社会)——认知或交互步骤和策略;(6)大量分析篇章语法和语言使用现象:衔接、照应、话题、宏观结构、言语行为、互动、话轮、标识、礼貌性、辩论、修辞、思维模式和篇章及话语的许多其他侧面。(Wodak & Meyer 2009: 2)

不过,对于篇章语言学等话语研究思路和方法,CDA则不大赞同。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89: 11)认为,会话分析<sup>①</sup>(conversation analysis)的优点是它对发生在实际交际情景的语言使用样本进行了分析,表明会话具有系统性结构特征,会话双方都具有遵循会话结构特征的倾向,据此来设计自己的话轮并对他人做出反应;分析指明结构特征其实就是社会结构,它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性宏观结构,而且也存在于人们日常的行为活动中,并在其中被生产。其不足之处在于,它不太愿意把“微观”的会话结构与“宏观”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各层次结构联系起来,如此一来,会话就像是一种远离社会实践、存在于真空中的活动。此外,由于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基本被忽略不计,会话双方就被赋予了平等地位,它们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被完全忽视了。最后,会话活动被视为是会话双方个人行为的结果,社会

结构被当作一种普遍性存在的东西,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会话分析往往从参与会话的社会行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其结果是它回答了“会话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却没有回答“它怎么变成这样?”和“它为什么是这样?”等问题。后两个问题恰恰是CDA所关注的,对它们进行回答不能仅依赖语言分析,还需要对更广范围内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分析,即“语篇研究和批评话语研究的最大差别在于后者采用的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建设性研究视角……它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对语言单位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由于社会现象必然比较复杂,因此需要一种多学科多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视角”(Wodak & Meyer 2009: 2)。

此外,篇章语言学的一些具体概念和原则被CDA研究者应用于理论构建和具体分析中,其中以范戴克的“篇章语法”影响最大。范戴克对篇章语言学的贡献是引进了“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概念,即“语篇中不仅仅在连续的句子之间存在局部的或微观的关系,而且在整体和全局上也有宏观结构决定语篇的整体连贯和组织”(van Dijk 2002),包括意义的整体结构和形式的整体结构两种。后者又称为“超结构”(superstructure)(van Dijk 1980: 12),即管理语篇整体形式或格局的摘要或图式结构。围绕着两个概念,范戴克还试图把语用学有关言语行为结构研究整合到篇章语法讨论中。由于这类局部(句子之间)和整体(语篇层次)连贯的研究(包括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依照转换生成语法发展出来的“生成篇章语法”难以应付,范戴克开始把目光投向以过程研究为导向的认知心理学,并在认知理论中为篇章语法包括宏观结构在内的许多最初想法寻找合理解释。期间,范戴克和认知心理学家金斯奇(W. Kintsch)等从认知视角对篇章生成和理解过程等进行探索,提出了“策略性”理解(strategic understanding)和“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等认知语言学概念来解释篇章的言语行为,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这些认知研究工作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篇章加工过程,对于一般性的、抽象的和与社会共有的认知表征(如知识)则关注有限(van Dijk 2002)。

不过,当范戴克最终将目光转向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话语、权势和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批评性研究时,他把先前与金斯奇一起开展的话语认知研究的一些想法与后来的社会认知、权势、种族主义、话语中权势的再现等想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意识形态与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等建立了一个以话

语、认知和社会等重要概念为基础的 CDA 整体分析框架,即社会认知分析视角(socio-cognitive approach)(van Dijk 2009, 2010)。具体来说,它是一种话语-认知-社会的三角理论框架,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各个层面上都以语境模式为中介进行互构。在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社会认知分析首先考察宏观语义结构(semantic macrostructure)和局部语义,然后考察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特别是突出交际实践语用特征的那些语言手段),紧接着考察将篇章与语境联系起来的“语境模型”、对意义进行解释的事件模型(event model)、集体的社会认知等,最后考察社会的微观和宏观结构与话语之间如何通过认知进行互构。可以说,范戴克早期篇章研究中提出的“宏观结构”和中期篇章认知研究中提出的“语境模型”等篇章概念和分析方法既是促发其发展出“社会认知分析视角”的重要因素,也是其社会认知分析框架的最重要理论构成部分。

#### 4. 语言与社会

一般认为,所有探索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或者说,探索语言使用与使用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那些研究就是“社会语言学”(Coupland & Jaworsky 2009; Spolsky 1998)。从研究内容和视角看,它明显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把“语言”作为研究内容,考察社会对语言的影响,揭示语言的本质;二是把“社会”作为考察起点,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问题或社会资源来研究(Fasold 1984/1999)。后一种倾向又被称为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从大方向上来说,CDA 的研究本身就可以归入后一种社会语言学研究,尽管两者在一些具体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不过,本文要具体讨论的是前一种社会语言学在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对 CDA 的影响。

总的来说,对于 CDA 影响最大的仍属拉波夫(W. Labov)社会语言学变体学派(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特别是他对语言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看法。现在,社会语言学通常被视为与形式语言学完全不同的语言研究领域,而事实上,拉波夫在《研究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拉波夫 2001:78-176)一文中曾强调,他研究的是语言群体中正在使用的语言,其目的是构建一种能对这些真实语言材料进行解释的语言理论;它针对的是语言群体这一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机构及其演变,研究主题包括那些通常被称为“普通语言学”的领域,如语音、语素、句法和语义等。之所以需要把语言放在更广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是因为,“任何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语料应该是本族语者在日常生

活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同上:79)。这是对标准“语言理论”(proper linguistic theory)的补充,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标准理论的一部分。

拉波夫指出,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都是以索绪尔关于“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划分及其“对语言事实的描述应集中在脱离社会语境的语言材料(即语言)”的观点上,这一立场的好处是研究者可以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在便于分析的、较为固定的抽象语言系统上,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然而,如果语法系统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大脑,那应该可以通过对每个人进行验证来获得语法资料;另一方面,对于言语资料,只能在个人使用语言时通过研究其行为来获得。这就产生了索绪尔悖论(Saussure paradox):语言作为社会集体特征主要通过观察个人行为来研究,而语言作为个人行为则只能通过观察语言在社会语境中的使用来研究。与索绪尔有所不同的是,乔姆斯基把语言研究视为心智研究,不过,他同样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应该是抽象的语法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他指出,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是抽象的、同质性的言语群体,其每一成员说着相同的语言,并都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该语言;语言学研究不是个人言语汇总而成的材料,而是他对语言的直觉(intuition)——最主要的是他对句子是否符合语法习惯的判断——及他对不同句子间相关性的判断——哪些句子的意思相同。拉波夫(2001)认为,乔姆斯基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继续了索绪尔悖论:既然语言群体是同质,那就没必要对每一成员的具体语言使用进行研究;既然语言学研究的是个人的语法直觉和判断,那就应该在一些个人身上进行验证。

当然,拉波夫并没有借此全面否定乔姆斯基的研究。相反,他觉得,后者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抽象语法层面使生成语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任何人想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都必须首先懂得如何在这一抽象层面进行探讨。换言之,拉波夫对乔姆斯基语言学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觉得他的研究对象应该进一步拓展,从而避免“索绪尔悖论”。他强调,尽管形式语言学的确有其优点,但人们不能忽视一个常识性的结论,那就是,“语言学研究的客体最终应该是语言群体所使用的交际工具;如果讨论的不是那一种语言(交际中的语言),那研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拉波夫 2001)。

在明确了研究范畴和对象后,拉波夫表示,其语言学研究想要做的是考察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建立一种与语言结构各个因素形成一一对应的模型,提出一些能够将模型各个组成部分联系起来并

使这些组成部分与经验事实联系起来的规则”(Labov 1994: 4)。他对马撒拉葡萄园小岛居民口音变化、纽约百货商场进行的关于语言变量(r)的使用、纽约黑人聚居的哈勒姆(Harlem)区黑人英语使用状况等的考察就是力图建构一种理论模型来证明,语言与社会结构存在对应关系,语言的使用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研究语言不能仅局限于抽象系统层面,还应着眼于具体语言使用的社会层面,就像库普兰说的,“变体学派的社会语言学的确把语言(事实上是言语)视为受社会条件限制的分布模式……在其理论构想中,具有能动作用的是系统——包括社会系统和语言系统——而不是个人”(Coupland *et al.* 2001)。

不过,寻找新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更像是其最终目标,就如他本人指出的,“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语言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语言理论,而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拉波夫 2001: 105)。为此,拉波夫抛弃了传统语言学的描写方法,吸收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方法,根据研究目的设计调查项目,通过记录、访谈、观察等收集数据,然后运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寻找语言使用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最重大的创新是用录音机来记录日常对话,从而第一次使研究者能够连续不断地把整个日常对话永久记录下来(Hudson 1996/2000)。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拉波夫是运用定量方法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先驱(同上),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拉波夫对语言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语言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不是其理论建构(丁信善 1999)。

归结起来,拉波夫的语言观与研究方法包括:(1)形式语言学研究尤有价值,应该予以重视;(2)研究不应停留在抽象的语言系统,应延伸到具体使用中的语言;(3)对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所做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什么新的语言学研究领域;(4)语言与社会结构存在对应关系,语言的使用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5)目前的语言研究应注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不是理论的创新;(6)对于日常语言使用,可以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学的定量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来找到答案。

拉波夫语言观对 CDA 的最大影响在费尔克拉夫看来是“语言使用受社会结构限制”(Fairclough 1989)的论断。正是接受了这一观点,语言的批评性研究才将“语言实践的社会建构特性”视为其研究的普遍性前提。不过,CDA 不赞同社会语言学的其他观点和研究方法,因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几个明显的弱点。首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受到社会科学

实证主义学派的强烈影响,语言变体被视为一系列的事实,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和研究,它对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清楚描绘,却无法说明现存语言秩序如何会出现,怎么做才可能使它们对被支配人群更有利等?其次,社会语言学考察语言与社会阶层(social class)的关系,但其所谓社会阶层更多时候指的是与职业、教育程度及其他社会指标相联系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a),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只有在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阶层”才与经济有关系,社会语言事实才可以被视为是不同社会阶层相互斗争的结果并代表不同阶层力量对比的某种平衡,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研究才能回答“如何会这样?”及“为什么这样?”等问题。再次,由于社会语言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它对自己的研究与现存社会秩序的关系很少予以思考,往往把社会语言材料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没有过多考虑语言材料以及可能的变化背后的社会条件,这固然可以减少语言学家对分析结果的人为影响,但将语言材料当作一种事实的做法却在实质上使现存语言秩序得以合法化,并间接使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得到维护。总之,费尔克拉夫认为,社会语言学与 CDA 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虽然认为应研究社会语境中的语言,并认为语言使用与社会结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没有进一步考察关系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CDA 不仅注意这一问题,而且还致力于考察和解决这一问题。

## 5. 语言的社会功能

从语言研究角度,特别是语言分析角度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对 CDA 的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在“如何看待语言?”这一问题上,韩礼德与费斯(Firth)及拉波夫的共同看法是,语言与社会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与社会——或者……语言与社会人(social man)——是一个合二为一的概念,它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考察”(Halliday 1978/2001: 12)。具体来说,儿童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从一个对社会一无所知的纯生物有机体,成长为一个了解社会生活方式、懂得如何以社会成员身份来行事的过程,语言是学习的最主要传输中介。反过来看,学习母语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掌握语言基本功能的过程,也是建立与各种功能相对应的意义潜能的过程。因此,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朱永生等 2004),语言功能存在于语言系统本身,具体的语言使用就是人们在语言与文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选择。研究语言不仅要研究语言系统本身,也要研究社会语境中的语言。

韩礼德认为,现代语言研究主要包括语言本体研究和超越语言本体研究,而后一种又分为心理认知视角(把语言看作一种知识即 knowledge)、社会文化视角(把语言看作一种行为即 behavior)及文学欣赏视角(把语言看作一种艺术即 art),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属于第一个视角,系统功能语言学属于第二个视角,语篇分析研究属于第三个视角。这些研究应该齐头并进,不可偏废(Halliday 1978/2001: 12)。但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视角(他又将之称为 *intra-organism studies*),并取得积极进展,而第二个视角的研究明显不足。韩礼德将自己的重点放在第二个视角的研究,其目的不是希望用第二个视角研究来取代第一个视角研究,而是为了改变以往语言学在第二个视角研究上存在的相对滞后局面,以此为语言学研究整体做出贡献。

由于把研究中心从单个有机体内部转移到多个有机体共同构成的社会,韩礼德不再把个人语言潜力仅仅视为一种个体内部的语法能力,而是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把语言视为具有社会功能的符号。在他看来,个人的语言潜势是其身处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发展和维持的一种工具。研究语言就是要考察语言能做什么,或者说,说话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能用语言来做什么,通过考察语言在社会繁衍形成的功能来解释语言的属性、内在结构和模式等。这一视角可以避免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实际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后者研究的是理想化状态下的说话者如何造出符合语法的句子,把自然语言简化为一种形式系统,排除了对社会语言变体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固然使语言学能够从形式上,甚至逻辑上,对语言进行较为精确的描写,并找出语言生成转换的一些规则,但这些描写和规则只能在理想化的状态下才能成立,一旦放在社会语境中,它们很少能够具有同等有效性。

在社会功能视角下,韩礼德把语言视为包括语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音系系统三个层次在内的符号系统,语义系统体现于词汇语法系统,词汇语法体现于语音系统;他又区分了“能为”(can do)、“能表”(can mean)和“能言”(can say)三个层次,说明语言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能为即语言中的行为潜势,能表即语言的意义潜势,能言即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使用。“能为”体现于“能表”,而“能表”体现于“能言”。通过区分语言的不同层次及其在系统中的不同作用,韩礼德把语言与系统、意义潜势和行为潜势、语篇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为确定语篇的功能与社会行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他把研究重点放在语言的词汇语法层面,这是因为,语言在

语义层面上具有人际功能、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三大元功能,它们通过词汇语法层面得到体现,词汇语法层面又通过语音层面得到体现。具体的语言使用就是人们在语言与文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选择。但是,在具体语言使用中,语义层面是抽象的、深层的,不能直观感受,语篇层面是具体的、可见的,语音层面只表达词汇语法特征,不表达语义特征。要了解语篇的功能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人们只能通过分析语篇层面来获得。据此,韩礼德先后创立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构建描写词汇语法特征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及能够揭示词汇语法、语篇语义和语境之间体现关系的研究方法。

韩礼德的语言观及功能语言学对 CDA 早期研究之一的批评语言学(CL)具有重要影响,后者在其开篇之作中曾明确表示其研究目的是揭示语言实践如何被用作制造社会不公和掩盖事实真相,其借鉴的语言学研究和分析模式就是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Fower *et al.* 1979; Kress & Hodge 1979)。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认为,韩礼德对批评语言学的影响具体有几个侧面。首先,批评语言学赞同韩礼德关于“语言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Halliday 1973: 65)以及具体的语言使用就是人们在语言与文化允许范围内的一种选择等观点。其次,对于语言研究,批评语言学还把韩礼德的“行为意义的组织应该对其社会基础给予一定的关注”(同上)进一步发展为“批评语言学试图从篇章的‘行为意义组织’中读出‘社会基础’的构成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在交际语境和更广范围内的社会语境中介绍话语表达的社会意义”(Fower *et al.* 1979: 195-196),也就是说,批评语言学试图在韩礼德功能语言学基础上构建出一种可为非语言学专家使用的分析方法。再次,在语篇分析上,批评语言学大量借用韩礼德的“系统语法”用于分析语篇中的语法和词汇使用。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与概念意义相关的“及物过程”(transitivity)、“转换”(transformation)的语法过程、与人际意义相关的“情态”(modality)等。通过借鉴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在揭示语言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阶级控制他人的工具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批评语言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Fairclough 1992)。首先,虽然批评语言学强调要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但它过于从最终产品的角度关注语篇,极少从生成过程和理解过程来研究语篇。在其分析中,语篇特征和社会意义往往被刻画成一种直接的和透明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一旦语篇被确定为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意义,它就被想当然地认为必然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后果。其次,批评

语言学单向强调语篇对现实社会生成现存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影响作用,忽视了语篇是社会斗争发生的场所,也忽视了语篇变迁是更广范围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维度,即它没有意识到语篇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为建构关系。再次,批评语言学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认识过于狭隘,它只关注语法和词汇的意识形态作用,没有意识到语篇的作用可能更为显著;它主要分析独白式的书面语篇,没有关注口头语篇组织方式(如话轮转换,turn taking)的意识形态作用;它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实现方式,没有考虑其被理解的过程。总之,批评语言学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理解采取的是一种单向的、静态的视角。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单向、静态的视角与CDA的双向、动态视角无法调和,批评语言学研究的许多学者后来逐渐转向采用其他理论框架,不再使用CDA的研究视角(Wodak & Meyer 2009)。

与批评语言学不同,费尔克拉夫主张用辩证互构的视角来理解语篇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实践包含着符号因素,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符号等都属于社会实践因素,它们之间辩证地联系在一起,CDA就是要分析符号(包括语言)和社会实践其他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他(Fairclough 1992)根据韩礼德提出的“语篇具有三大元功能”发展出了语篇具有“三大建构作用”:语篇帮助建构“社会主体”和“各种个体”的“社会身份”和“主体地位”;语篇帮助建构主体间的社会关系;语篇帮助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他将之称为语言的“身份”功能、“关系”功能和“概念”功能,并指出“身份”功能和“关系”功能实际上就是韩礼德的“人际”功能。他又把韩礼德的“语篇功能”分离出来,专门用于说明语篇组成要素的内在关系、当下语篇与其他语篇的关系、语篇与语篇外当下社会语境的关系等。如此一来,分析语篇就可以发现语篇内部及语篇与外部的联系,还可以发现语篇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此外,他又指出,社会机构有具体的实践活动、现存社会关系和身份,这些都是话语中建构出来的,但它们又反过来物化为具体机构及其实践活动,话语的建构必须与其他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才能产生效果,话语建构活动必然在社会结构限定的范围内进行,这表明话语建构活动是受社会结构约束的建构活动。因此,分析语篇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的限定特征。分析语篇与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步骤,语篇分析只是第一步,阐释分析结果是第二步,而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进行解释是第三步,只有把三个步骤都包括在内,分析才算是完整的,才能真正解释两者间的辩证互构关系及蕴含于此过程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在语篇分析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

适的分析手段,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就是一种操作性较强的分析工具。据此,费尔克拉夫构建了其语篇分析的三维模式,并在研究实践中大量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可以说,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费尔克拉夫辩证互构视角构建语言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最重要语言理论依据,其系统功能语法又是费尔克拉夫语篇研究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 6. 结论

总的来说,从语言学角度看,CDA主要关注的是语言使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它具有较大影响的语言研究理论主要是那些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说,包括语言相对论、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等。语言相对论的影响主要是其“语言反映社会现实和世界由语言建构”及“人的认知是互构得以发生的中介”等观点。篇章语言学的影响是其提出的篇章概念、篇章基本特征及篇章分析方法等。社会语言学的影响是其“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及“语言使用受社会结构限制”等观点。韩礼德社会功能语言学的影响就在于其提出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和“语言具有社会功能”等观点以及系统功能语法的分析方法。

## 附注

① 严格来说,会话分析是源于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与篇章语言学没有关系,不过,从研究对象及分析方法来说,它与后者等的思路相似。在此,本文将之受到的批评与包括篇章语言学在内的话语分析受到的批评等同起来。

## 参考文献

-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upland, N. & A. Jaworski. (eds.). 2009. *The New Sociolinguistic Reader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de Beaugrande, R. & W. Dressler. 1981.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 R. Wodak.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T.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2))* [C]. London: Sage, 259-284.
- Fasold, R.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owler, R., B. Hodge, G. Kress & T. Trew.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78/2001.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Hart, C. 2005.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oward a cognitive approach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 (2): 189-195.
- Hart, C. 2011. Force-interactive patter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22(3): 269-186.
- Hudson, R. 1996/2000. *Sociolinguistic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Kress, G. & G. Hodge. 1979. *Language as Ide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 Labov, W.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 Sapir, E. 1912.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4(2): 226-242.
- Sapir, E. 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J]. *Language* 5(4): 207-214.
- Spolsky, B. 1998. *Sociolinguistic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ubbs, M. 2002.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In M. Toolen (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3) [C]. London: Routledge. 202-218.
- van Dijk, T. 1980. *Macrostructure* [M]. NJ: Lawrence Erlbaum.
- van Dijk, T. 1993.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society [A]. In D. Crowley & D. Mitchell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C]. Oxford: Pergamon Press, 107-126.
- van Dijk, T. 200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A]. In P. Chilton & C. Schaffner (eds.). *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 Analyt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 [C]. Amsterdam: Benjamins, 204-236.
- van Dijk, T. 2009.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 2010.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orf, B. 1940. Science and Language [J]. *Technological Review* 42: 229-231.
- Wodak, R. 2006b. Medi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Assessing cognitive approach in CDA [J]. *Discourse Studies* 8(1): 179-190.
- Wodak, R. & M. Meyer.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2<sup>nd</sup> edn.)*. [C]. London: Sage. 1-33.
- 丁信善. 1999. 试论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观及其方法论[J]. *外国语* (2): 1-9.
- 拉波夫. 2001. 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朱永生等. 2004. 功能语言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管新潮)

(上接第5页)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enuti, L.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马会娟、管兴忠. 2010. 发展学习者的汉译英能力[J]. *中国翻译* (5): 39-44.
- 王宏、张玲. 2016. 中国专业翻译学位教育:成绩、问题与对策[J]. *上海翻译* (2): 13-17.
- 王宏. 2007. 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J]. *上海翻译* (2): 4-8.
- 王宏. 2011. 怎么译:是操控,还是投降?[J]. *外国语* (2): 84-89.
- 王宏. 2012a. 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王宏. 2012b. 汉英能力构成因素和发展层次[J]. *外语研究* (2): 72-76.
- 王宏. 2012c. 中国典籍英译:成绩、问题及对策[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4): 9-14.
- 杨晓荣. 2002. 汉英能力解析[J]. *中国翻译* (6): 16-19.

(责任编辑 管新潮)

### 王宏教授简介

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副会长,已出版发表学术成果100项,其中译著43部、学术论文57篇。其代表作全英文版《梦溪笔谈》(*Brush Talks from Dream Brook*)、《明清小品文》(*The Short Essay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清代城市生活长卷》(*The Urban Life of the Qing Dynasty*)分别于2011年、2013年和2014年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Paths International Ltd.)出版,全英文版《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Rethinking Education: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2012年由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The McGraw-Hill Education Companies)出版。王宏教授还主持国家出版重大工程“大中华文库”《墨子》(汉英对照)、《梦溪笔谈》(汉英对照)、《山海经》(汉英对照)、《明清小品文》(汉英对照)、《国语》(汉英对照)等。新华网、光明网、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扬子晚报》、《苏州日报》、《姑苏晚报》等媒体曾多次采访王教授,对其在中国典籍英译领域做出的贡献予以广泛的报道。